

蔡元培

学界泰斗 人民哲匠

蔡元培被同时代人异口同声地被誉为“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匠”绝非偶然。一方面，他自幼饱读经书，倍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学术权威翁同龢评他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二方面，得益于中年后前后五次出国留学考察，居外近 12 载，他称得上是其同代人第一个真正对西方文化进行过“上下求索”的人。他将其所接受的中西文化糅合成自己的独特思想，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时代高度。所以，1931 年中央研究院同人为他献 65 岁寿联曰：“萃中土文教精神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坚强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教育家，和不断追随时代前进的民主主义战士，毛泽东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一、从科举连捷到民主主义革命家

蔡元培 字鹤卿 号子民。1868 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他自幼刻苦好学。家贫不能置灯，就借炉灶火光映读。一次 他在楼上读书 宅中起火 举家惊恐 疾呼他下楼 他因全神贯注于书本 竟然全不察觉。少时虽习作“八股文”，但不为旧套束缚，常将“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怪之句法易常调”。他“以一物不知为耻”，什么书都读。17 岁考中秀才，23 岁中举人，24 岁中贡士。26 岁录为进士。后进翰林院。一个二十多岁的蔡元培已成才华横溢“声闻当代 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

正当他在科举道路上平步青云时，腐败的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中惨遭失败。蔡元培在痛哭流涕之余，开始探索救国之路。广泛涉猎西学译本和变法图强之书。他服膺谭嗣同之言行。对康梁变法不以为然，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在于未先培养维新人才。他弃官归里，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时，他公开支持宣传进化论，主张男女平等，甚至将男女平权，婚事新办，作为自己续弦（原妻王昭因病逝世）的条件。

1901 年，他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并提倡民权、女权。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他告诫学生，要了解国际，便要学外文，读外国书，还要学会演说，以便唤醒民众。在他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演说会。1902 年，他与蒋观云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它是 20 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教育会成立不久，他与蒋观云创办爱国女校，这实际是一个革命机关，后来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 当局以蔡元培平日提倡民权 完全归咎于他 他便率领退学学生一百余人 花了10天时间，又创办了一个爱国学社。学社创办之初，经费十分困难，蔡元培不顾长子病危，自动前往南京筹款，到码头时，家里来人报告儿子已经气绝，他含泪托教育会同人代办后事，仍然挥泪登轮，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感动。

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又与章太炎等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每周率领学社成员到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并与《苏报》取得联系，约定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天写一评论，从此《苏报》成为上海革命党人宣传阵地“崇论横议 震撼一世”。

1903年，东京留日学界掀起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在上海领导中国教育会积极响应，相继在上海成立保国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

1904年11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革命团体一光复会，广泛吸取革命志士与会党群众参加 徐锡麟、赵声、秋瑾、李烈钧等均成为坚强战士。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齐名，在同盟会成立前，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同盟会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上海分会会长。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布下了革命种子，建立了革命根基。

二、罕见的留学生涯

甲午战争后，蔡元培通过阅读介绍外国国情和科技知识的书，固然眼界大开，但终究是不得甚解。为了直接学习西方文化，他于1896年产生去“海国”（海外之国）的愿望，于1898年开始学习日语，1899年学习英语；1902年，学习拉丁文；1903年，学习德语 以后还学过法语、意大利语和世界语 可谓终身不辍。蔡

元培因不满清朝政府的统治，于 1898 年抱着义无反顾的激情自动离职南下 走向革命道路。1906 年 他见报载学部将公费派遣翰林游学 为了出国学习 他又委屈折节 返回翰林院销假 静候留学。这虽是他最不安之事，但如他当时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盖弟数年来 视百事皆无当意 所耿耿者 惟游学一事耳”。为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他执着地要到德国留学。旋因赴欧美者少 清廷经费拮据 全部改派日本。蔡元培的留学愿望又成泡影。

1907 年 6 月 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抓住机会 托人游说 表示愿在使馆供职 以便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 30 两 并不要求他工作。加上商务印书馆与他订约编书 每月送他编辑费 100 元 留学经费基本解决。于是 他随孙宝琦坐火车经西伯利亚赴德留学，因长途跋涉一月有余，抵达柏林早已疲倦不堪。然一想到可以直接学习西方文化 亲身体验新的生活 又精神奋发 斗志昂扬了。在柏林 他不仅苦学德语 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还担任唐绍仪子侄四人的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

1908 年秋，蔡元培入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这里环境优雅 学术空气浓厚 教员也是欧洲第一流的。但当时留学费用高昂 蔡元培经常入不敷出 为减少房租支出 他曾迁居 5 次 他的留学生活可谓半佣半丐生涯。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如饥似渴地学习。凡哲学、美学、文明史、人类学等 只要时间不冲突 他都去听讲。据莱比锡大学档案记载 蔡元培在该校 3 年 共学习了 40 门功课。为探索西方社会迅速进步的原因，除学习人文科学外 他还研习自然科学 使其视野大大开拓。

蔡元培出于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目的，也十分着重研究欧洲社会怎样向近代文明过渡 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文化、改变中国的政治与教育制度必须参照之内容。为此 他进入兰普来西教

授主持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专习比较文明史。这个研究所很少有民族沙文主义偏见，能够平等对待各民族的文化，这有助于他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蔡元培很多关于中西文化的真知灼见，如：一种文化只有接受外来文化才有新生命；中国文化不仅要吸取外来文化以求发展，而且还要向国外输出；中国文化应从“输入欧化时代”步入“文艺中兴”时代等都形成于此时。

蔡元培偏爱哲学，在学习过程中，因感到范围太大，又集中精力攻读实验心理学与美学。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过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组织的“世界社”，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故回国后，曾不遗余力提倡美育，并幻想实践克鲁泡特金的平等互助和自由联合理论。

蔡元培在德 4 年 著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 翻译《伦理学原理》一册 均署名蔡振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伦理学原理》一书被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毛泽东当年极爱读这本书，说对此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

1911 年 10 月 辛亥革命成功。作为老同盟会员的蔡元培欣喜若狂 再也无法安心在异国大学的课堂上听讲 决定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一次留学生涯。

蔡元培一回国 便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他一上任 就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首先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与内容 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为今后的教育方针 培养‘外争民族独立 内行民主共和’的新型人才。使他在留德期间所形成的教育思想有了用武之地。1912 年 3 月，蔡元培在力辞不成的情况下，一度出任袁世凯政权的教育部长。他仿照德国大学学制 继续坚持改革。后来他发现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使人无法容忍 不得已 与宋教仁

同时辞职 并于当年 9 月，携家眷从上海再度赴德国留学。

堂堂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留学，在中外留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为追求真理 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 他什么委曲也能忍受。蒋维乔后来回忆说：“先生辞去教育总长以后 生活很苦 曾因听见有一个留学生的缺 便写信给教育部 要求派他出洋充留学生。”部里同仁接到他的申请 以他是前任总长 乃设法为他筹款 将这个留学生的费用给他留学 名义上并不叫留学生。

蔡元培到德国后，再一次到莱比锡大学报到，继续尚未完成的学业。这一次留学时间甚短 他只选修了 3 门课程，一为欧洲人怎样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文明的历史 二为古代巴罗艺术 三为美学。

1913 年 3 月 20 日 宋教仁遭袁世凯杀害 孙中山认为非除袁不可 主张武力讨袁。蔡元培应孙中山电召回国 毫不迟疑地加入讨袁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 蔡元培决定再赴欧洲研究学术。为筹措留学费用 再一次与商务印书馆约定 每日以半天为商务印书馆写专书，商务馆每月送致稿酬二百元。1913 年 9 月 5 日 蔡元培偕夫人和 3 个儿子乘轮离开上海 赴法留学。他仰慕法国的革命传统、民主制度与先进文化 尤其赞赏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摆脱宗教束缚的教育制度。10 月中旬 他抵达法国马赛 随即移居巴黎附近的科隆布镇。最初，一家人栖居在吴稚晖创办的“世界社”印刷局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被迫移迁到法国西南部 主要住在都罗斯。他一边学习法语，一边依约从事繁重的译著工作 这期间的成书有《哲学大纲》、《赖斐尔》、《康德美学》等。

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 还极力倡导勤工俭学 并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到法国后 详细考察旅法学生的情况。1914 年欧战

爆发后 全法国骚动 留法学生也以战争危险、经费断绝和学校停课而纷纷要求回国。蔡元培不愿看到大家因此失去大好的留学机会 乃出来劝阻。并采取诸如临时救济、将他们迁往安全地带、帮助转学等措施来解决留学生的困难。

欧战爆发，法国工人大批上前线，使工厂劳动力严重不足。1916年春，法国陆军部派陶履德到北京办理招工事宜，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3月29日蔡元培与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欧乐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成立后 主要抓了两项工作 第一 与法国工部局商议 由华法教育会代在中国招收华工；第二，在法国开办华工学校。蔡元培亲自为华工学校编写讲义 编辑出版《旅欧杂志》。

蔡元培主持的留法勤工俭学大大便利了国内无力出国的青年以半工半读形式到法国留学。从1915年5月至1920年1月，仅八个月时间，去法勤工俭学者就有702人，1921年出国者更达1700余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通过与法国工人广泛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毅、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变化。当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立即筹组御侮会 当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时 他热情呼唤新时代的到来。1916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请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回国培养人材比在国外学习更重要 乃欣然回国。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 惨淡经营 成绩的确辉煌。但在军阀政府统治下 矛盾重重 使他手足难措。1920年 他为避开矛盾 又以考察欧美教育为名 游历法、德、奥、意、荷、英、美等国 历时

40 个月。在这期间，他考察各国大学教改情况；邀请外国教员来华任教 为北大募捐 购买仪器及修建图书馆)交涉收回庚子赔款 用以兴办教育。

他回国后，国内依然处在军阀混战之中，教育危机更加严重，主要表现在教职员的工资不能及时发放，教育经费无着落。蔡元培为此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与教会之外 但无人理睬。1923 年前后，政府当局因内部权势之争，两次非法逮捕北大兼职教员罗文干。蔡元培痛心于国内政治清明无望，不屑与其同流合污，又愤然辞职，开始最后一次留学生涯。

开始，他在法国，从事著述，并协助李石曾办法华教育会及里昂大学。1924 年 4 月 蔡元培赴伦敦 被留英“中国学生退款兴学研究会”举为代表，向英国当局商洽退还庚子赔款，供中国兴办教育。8 月，向北京政府电请，赴瑞典出席国际民族学会议。与会期间，遇见原莱比锡大学的同学但采尔教授，他盛赞汉堡民族博物馆资料丰富，劝蔡元培前往。1925 年 1 月 蔡元培移居德国汉堡大学，开始民族学研究。

远离祖国的蔡元培并未沉醉于民族学资料之中，相反，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当“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反帝运动高涨时，他致电北京大学和全国各团体，表示支持。为澄清国外一些人士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曲解，争取各国人民的支持，又在汉堡写成《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书 译为英、法、德三国文字，分送欧洲各报发表，表现了他高尚的爱国热忱。至 1926 年初，才结束最后一次留学生活，回到祖国。

三、出任北大校长 为新文化运动开路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失败后 它将其官僚

腐败习气嬗继下来。学生抱科举意识，视入学为做官阶梯。他们反对认真教学者，欢迎经常请假、年年发旧讲义的官僚兼职教员，欲以其为靠山而步入仕途。形成学政法的为工科生的 10.5 倍。学习空气淡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除上课外，没有任何正当的社交与娱乐活动，而以嫖妓为能事。许多好心的朋友都劝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但蔡元培以学校腐败，更需人治理，仍决心任职。

1916 年 12 月，蔡元培任职的第一天，发表了就职演说，勉励学生做好三件事：一、要抱定宗旨。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二要砥砺德行。他说：“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乃组织进德会，自任会长。规定不嫖、不赌、不娶妾为起码之会员条件。三要敬爱师友。他认为学校办得好坏，关键在教师。他大力号召学生尊敬师长。为丰富学生的社交与文体活动，他发起组织体育会，音乐会，雄辩会及科学会、研究会。他还打破惯例，招收女生入学，又举办夜校，提高校役文化，倡导平民教育团，将业余教育推向社会。

蔡元培整顿、改革北大的最大特色是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是他留德期间接受柏林大学创建者冯波德影响的产物。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允许其存在，听其自由发展。他到校不十日，首先聘请因编辑《新青年》而出名的陈独秀为文学院长，不久，又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兼经济系教授，加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和原来的教员沈尹默、沈兼士等，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自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方面，聘请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李书华等学者任教授。法科方面，聘请马寅初、陶孟和、周鲠生等知名学者。1917 年暑假，北大连续招生三次，同等学历亦可报

考 考试合格就录收 不受名额限制。因此 北大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与学生，有利改革事业的推行。

蔡元培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对于教员，主要看有无专门学问，至于政治倾向，只要不影响教学，也予录用。如政治上保守，但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辜鸿铭、刘师培等均被聘为教授。梁漱溟报考北大未被录取，后来蔡元培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文章，认为不失为一家之言，也破格聘为教员。而对于那些不学无术之人，不论其背景如何，坚决辞退。一个被辞退的英国人 请来公使与蔡元培交涉 威胁说：“蔡元培是要不要再做校长了。”他一笑置之。英公使又向北京政府外交交涉 外交部要蔡和平解决 蔡顶住压力 不做更改。表现了一个教育改革者的坚定决心与胆略。

蔡元培大胆改革学制，沟通文理，推行选科制。他认为学生“有特长者 不应屈之以普通 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为先导”学分制可使那些才能优异者得到及时发现，能使之更快地成材。这些制度，经他推行后，均为国内各大学所采用。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新青年》创办历有年余 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蔡元培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方针，恰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 1917 年下半年，《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新文化运动乃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席卷中华大地。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方面的胜利，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欢乐与希望。 1918 年 11 月 蔡元培向北京政府借天安门露天讲台，邀请北大教职员向民众演说，当时参加演说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马寅初、陶孟和、江绍原等二十余人。蔡元培作了著名的《劳工神圣》演说。在演说中 他抨击那帮不劳而获的达官显贵，将压在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提到崇高

的地位 宣称“今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的演讲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劳工神圣”的口号从此震撼中华大地。

1919年5月初，他得知北洋军阀政府已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立刻转告北大的学生代表，从而酝酿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学生被捕后，他又亲自到教育部和警厅，以身家作担保，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蔡元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北大师生和全国人民的爱戴。

五四以后 蔡元培继续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成为马克思主义春风荡漾的绿洲。因此，李大钊在报刊上能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及《唯物史观》等课程中能直接宣讲马克思主义。1920年，北京大学出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元培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4月蔡元培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 他将新思潮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吃人的野兽。认为对待新思潮只能像治洪水一样，用疏导方法，让它自由发展；主张让新文化运动的洪水去冲卷像北洋军阀那样的猛兽，使中国得到太平。由此，北京大学很快出现一批初具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将革命火种撒向全国，从而开创中国的新纪元。

四、“大学院制”的失败与中央研究院的创建

1923年至1926年 蔡元培旅居国外 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了解。1926年他回国后不久 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 组成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在工农群众支持下 势如破竹。蔡元培自然支持蒋介石。乃至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帜发动“四

。一二·九”政变时，蔡元培一度附和反革命，参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蔡元培参加南京政府后，仍然主持教育工作。他自留学归来，一直欲实现他的“教育独立”和“教育学术化”的主张。他决定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在中国推行大学院制，将全国分成若干个大学区，每一大学区设校长一人，由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担任，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务。1927年6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长。但蔡元培没有想到：这一制度在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已有相当基础的法国能行之有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则根本行不通。推行不久，非难之声四起，在中央大学区的实验首先失败。李石曾又借推行大学区制之机蓄谋夺取北京大学和北方教育的控制权。蒋介石有意袒李抑蔡，任命李石曾为北平大学校长，使其夺权计划如愿以偿。至此，蔡元培对现实已完全失望。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正式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等职，随即携眷离开南京，定居上海。10月23日，国民政府改大学院为教育部，所有大学院事宜均由教育部办理，蔡元培推行的大学院制完全归于失败。

蔡元培与蒋介石之间产生裂缝后，将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创建中央研究院。早在1927年10月，蔡元培就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聘请了30余名专家任中央研究院筹备员。1928年6月9日，他召集有关负责人徐渊摩、丁燮林、竺可桢、李四光等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不久，聘任杨杏佛为总干事，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11月正式开始办公。

至1930年初，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社会科学、历史语言、及心理共9个研究所，拥有专任、兼任、名誉、特约研究员91人，助理员64人，编辑员8人，形成

了一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部门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科研队伍。从此 我国科学界摆脱了单纯介绍西方成就的局面 开始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

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是他继革新北大之后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又一重大贡献。他领导中央研究院的最大特点是知人善任 选贤任能 发扬民主 使人和机构均能充分发挥其效能。正如翁文灏回忆说：“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办法是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能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 均各能行其应有职能 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 蔡先生更能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 使其自行发扬 以寻求真理。”

1966 年，李济在一篇文章中，论及了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他说：“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从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在他的惨淡经营下 中研院才能萌芽 茁壮 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至 1929 年底 中央研究院建立了 9 个研究所，一些成果在学术领域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些成绩 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 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

五、为抗日救国 争取民主鞠躬尽瘁

北伐军攻占杭州、上海时 由留学同学吴稚晖介绍 蔡元培始与蒋介石相识。蔡元培曾幻想依托蒋介石的国民党来谋取国家独立 实现民主政治 发展民族经济和科学、教育事业。但清党以后的种种事实与蔡的臆想完全两样，蔡对蒋的政权开始不满。

1928年8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长及兼各职。10月初国民党政府改组，蔡被提名为监察院长，蔡坚决不就。有人问蔡为何不就？蔡答曰：“监察制度在民主国家中，发挥过相当力量，可是在现今‘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有什么可为的呢？”可见在他眼里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已是一个朋比为奸的官僚集团，他不屑与之伍，所以他除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外，拒绝担任政府任何官职。

1930年中原大战后，蔡元培参与和平运动，企图促蒋下野，更为蒋所衔恨。1931年，蔡元培通过杨杏佛与邓演达、陈铭枢等秘密商定，准备建立反蒋的第三势力与第三政权。后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邓演达被捕而无形中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我东北三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国成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妥协屈服，对内镇压革命。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3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并建立新的特务组织，撇开法律，秘密逮人，酷刑逼供，随意处死爱国志士与革命青年，这和蔡元培的爱国民主思想尖锐地对立。蔡元培深知民主是抗日的保证，要抗日就要有民主，就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为此，于1932年底，由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公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援救一切政治犯，并为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权利而斗争。《同盟》成立后，除继续营救牛兰夫妇等外，更在上海、北平开展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公开营救共产党人和所有政治犯，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抗议屠杀无辜，受到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莫大的威胁，如芒刺

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决定先向杨杏佛开刀，企图以此威胁蔡元培，迫使他们停止《同盟》活动。但蔡元培不为所屈。他一得知杨杏佛被害，就不顾个人安危，驱车赶到现场视察，立即致电当局，要求立即“飭属缉凶，以维法纪”。杨杏佛入殓之日，特务们放出风声，说要在这一天暗杀《同盟》其他成员。蔡元培仍置生死于度外，毫不迟疑地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表现了他正气凛然的大无畏气概。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蔡元培坚决主张抵抗。1932年淞沪抗战发生，他曾担任抗日合作技术委员会上海分会会长，他满怀爱国激情，将上海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罗致一起，从事抗日准备。他见蒋介石对日执行不抵抗政策，深表愤懑，写诗讽刺说：“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蔡元培为了推动抗战，一日，乘汪精卫宴请之机，语重心长地对汪说：“关于中日的东西，我们应当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着，老泪纵横，滴在西餐汤盘里，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使满座为之感动，更使汪精卫尴尬万分。

蔡元培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深得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赞许。1936年9月，毛泽东致书蔡元培，称颂他的爱国进步主张，希望他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继续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蔡元培由衷的高兴，认为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

蔡元培力主科学救国，他说：“一国国势的增长和科学事业的进步成正比例。”德国有了个克虏伯，就使本国的军械甲天下；法国有了个巴斯德，酿酒、造丝、畜牧业发达，国家财富顿增；美国有了个爱迪生，就开辟无数能源，出现了煤油、钢铁、铁路大王。“现在我们军械不足，交通不便，财政尤感困难。正需要许

多发明家 如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这一类人。”他认为培养专门人才 是中国“目前的急务”。为此 他一方面勉励中央研究院同仁坚守岗位 忠于职守 为发展祖国的科学献身；二方面他郑重发表声明：1. 辞去身兼的 23 个职务；2. 停止接受写件；3. 停止为人介绍职业；以便集中精力加强对中央研究院的领导。

抗战爆发后 中央研究院随政府迁往重庆 蔡元培因对蒋介石不满 不愿去重庆 加上身体不好 决定去香港 乃于 1937 年 11 月 27 日 由丁燮林等陪同离沪赴香港。

蔡元培居港期间 一直关心世界局势 痛心祖国山河大片沦丧 期望全国军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以香港房租贵、物价高 中央研究院所寄之月薪换成港币 为数无几 经济十分拮据 每次生病都未彻底治疗 尤因对国事的忧念 以致身体日衰，终于一病不起 于 1940 年 3 月 5 日溘然长逝。

蔡元培一生恬淡寡欲 廉洁奉公 想的是为国尽孝 为民造福 从不为一己打算。留学期间过半佣半读生活 以后几任要职，仍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到死时连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他为公服务几十年 身后极为萧条 连欠 1000 余元的医疗费也无法付，衣衾棺木，还是老友王云五代筹的 后来国民政府发给治丧费 5000 元 才得以解决。

蔡元培逝世后 国民政府传令褒扬 中共中央致电悼念 全国未沦陷的各大城市都开追悼会。不论海内外，不分政治派别，无不同声痛悼。都称他是“推转时代巨轮”的“人民哲匠”。

（杨宇清）

穆藕初

自强不息 棉纱巨子

1943年9月16日最早在中国推行“科学管理”的民族实业家“棉纱巨子”穆藕初因患肠癌，在抗战后方山城——重庆与世长辞。巴山哭泣，蜀水哀鸣，恶耗很快传遍中华大地。

抗战胜利后，穆藕初虽已离世多年，人们仍在苏州、上海举行多种悼念活动，纪念这位“赤手成功，万方衣被，付与儿曹好模范”的近代中国优秀企业家。他年轻时为了“救亡图存”就立志学习“西学”，经多方努力，中年自费出国，留美5年，舍命苦读，归国以后，不仅创办众多实业，泽惠万民；而且贡献诸多良策，振兴祖国。真是义比云高，功盖中华。他的品质与业绩，将永远激励千百万炎黄子孙，为国家富强而前赴后继地不懈斗争。